

莎士比亚作为方法

——与乔治·华盛顿大学 Alexa Huang 教授一席谈

■ 濮 波

一、全球化莎士比亚研究现状一瞥

在莎士比亚诞辰 450 周年、鸦片战争 170 多年的时候，在中国谈论莎士比亚的研究和批评，是一个普遍性和差异性问题扭结在一起的问题。今年初，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举办《全球化莎士比亚：定位世界市场和档案》研讨会，我前往参加。席间我有幸与“全球化莎士比亚”研究的提倡者 Alexa Huang 有了几次面对面的交谈。对于她倡导的“全球化莎士比亚”研究方法有了进一步了解。



《全球化莎士比亚：定位世界市场和档案》论坛一角

莎士比亚研究在全球化的时代具有一些相似的景观。走过了文学研究、心理分析美学研究、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流派的洗涤，如今的莎士比亚研究可谓依然汗牛充栋，但缺少中心。如此庞杂的文本中，融合和糅合，依然是大多数学者的选择。比如美国的阿兰·布鲁姆^[1]和哈瑞·雅法^[2]合著的《莎士比亚的政治》^[3]提供了政治哲学和古典文学自然地融汇于一体的研究新视角，捍卫了经典作品具有的“教化升华”之能量。他们的坚信代表

了很大一部分学者的观点：“莎士比亚仍然可以作为我们的教育资源，提供人类美德和高贵人生的必要课程。他受到我们传统的尊重，并且他属于我们的语言。莎士比亚被更本真地阅读，当他最生动而广泛地展现出暴君的命运、明主的性格、朋友的情谊和公民的责任时，他触动了读者的灵魂。读者意识到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因莎士比亚而深刻，于是他成为不朽的领路人和同行者。他扮演着《圣经》曾经扮演的角色，人们通过他的眼睛观看到更加丰富多彩的世界，这恰恰是我们已然失落的视角……因此，批评的正确作用在于复兴莎士比亚的教诲，并且成为他在盎格鲁世界的永久训导的代理人。”（《莎士比亚的政治》：前言）。

莎士比亚研究的普遍性还体现在一种文化、地理、哲学、物质性内在关系的紧密性上。如当代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大卫·卡斯頓（David Scott Kastan）^[4]的《莎士比亚与书》提出了一个新颖的研究莎士比亚的视角，阐述了媒介与作品的互动。莎士比亚的戏剧起初是用于表演的手抄本，而后成为可以阅读的书，最终从一种大众娱乐变为英国的文学经典——这一

非凡的历程。本书强调了莎士比亚与英国的共生关系，指出了改写和适应媒介和时代物质性条件，是450年以来莎士比亚全球传播的一个共同的景观。

其次是差异性。同样是在大卫·卡斯頓的众多著作里，关于莎士比亚的政治观、宗教观、叙事手法、悲剧观等困扰学界的问题都“有着不同于东方学者的看法”。比如，大卫·卡斯頓的观点就与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有着天然的区别。前者维护莎士比亚正统性的江山，认为莎士比亚的政治观是普世的——主要表现在对人类不平等现象的关注，这一关注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5]而后者东方的、非西方血统的学者则试图打破这种言论的附带的血统优势和文化优势。指出这种看似坚固的观点之背后潜伏的霸权思想的毒害。

这些冲突的核心在于一种全球化愈演愈烈的西方逻各斯中心、盎格鲁逊世界为中心（或者中心/外围）之认识论模式继承和逆反之间的激烈冲突。在爱拉·肖哈特与罗伯特·斯坦姆《不加思索的欧洲中心主义》中，这种冲突被描绘成一种“需要重新绘制的全球化地图”的基础。张英进在《影像中国》一书中摘引如下：

在詹姆逊的文章中，第三世界似乎永远都落在了后面……注定要永远陷在一场追赶的游戏之中，只能亦步亦趋地再行重复那个“先进”世界的历史。当第一世界达到了资本主义晚期和后现代主义的阶段时，第三世界正在向着现代主义和资本主义开端蹒跚而行。詹姆逊就这样忽略了世界体系理论，他将第一和第三世界视为经历着同一个历史时刻，尽管第三世界是在压迫的模式下经历着这一时刻的。……在我们看来，“后现代”并不是一个尊称，第三世界的后现代主义也不一定就与第一世界的后现代主义完全相同。一种更为充分的理论构建会将时间视为在所有这些世界中都是混杂性和复写性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和超现代在全球共存，尽管不同地区之间“统治性”的类型也许各不相同。^[6]

两种坚持，两种“毒害”，到底我们应该遵循什么立场？以我一个亚洲大学博士生的身份，我进入了西方主流的莎士比亚研究圈。我的感受依然是悖谬的。即这个主流体积庞大，而且话语逻辑严密，甚至密不透风。亚洲人一般很难融入这个圈子。而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Alexa Huang教授之“全球化莎士比亚”研究，显然是一个特例。



乔治华盛顿大学英文系终身聘任教授及研究所所长 Alexa Huang

二、Alexa Huang 的研究侧重和方法

1. Alexa Huang 的学术研究重点

Alexa Huang 教授，现任乔治华盛顿大学英文系终身聘任教授及研究所所长、英国 Stratford 国际莎士比亚协会永久会员兼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员、《国际莎士比亚年刊》总编辑、牛津大学林肯学院（Bread Loaf 硕士学程）文艺复兴英国文学领域导师、英国 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社《全球莎士比亚丛书》总主编、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莎士比亚（*Internet Shakespeare Editions*）表演部总主编、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LA）莎士比亚集注本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LA）现代东亚文学研究委员会委员、美国亚洲戏剧研究学会副主席、美国中大西洋地区亚洲研究会副主席、山东大学文艺美学中心兼职教授及合作博士生导师、美国《今日华文文学》书评主编。

2. Alexa Huang 的学术理路和方法

(1) 参与“全球化莎士比亚”的跨界与合作。Alexa Huang 创办麻省理工学院的“全球化莎士比亚研究机构(The Global Shakespeares Video & Performance Archive)”^[7] 全球化莎士比亚是一个参与性的多中心的提供广阔的国际表演达到对莎士比亚戏剧理解之转变、超越的网络模式。通过合作和参与, Alexa Huang 充实和吸收了大量的全球性莎士比亚演绎和改编的案例。她早年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以及自己通晓多国语言的基础, 为她建立一种全球性的客观眼光, 进一步参与全球化莎士比亚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外, AlexaHuang 也参加了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全球莎士比亚剧作数据库建设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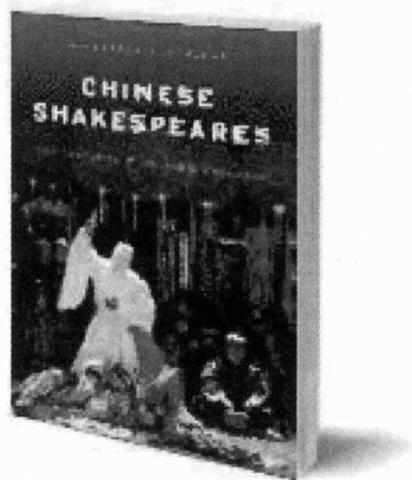


网页截图之一：全球化莎士比亚的资料库作品展示



网页截图之二：全球化莎士比亚的资料库之“亚洲部分”剧目和资料展示

(2) 全球化时代的莎士比亚资源的杂糅和“块茎”理论。以《中国的莎士比亚：两个世纪的文化交流》(Chinese Shakespeares: Two Centuries of Cultural Exchange) 为例说明她的学术观点。这本书糅合了台湾、香港和大陆的莎士比亚长达 200 年的学习、改编和演绎。在 Alexa Huang 与 2014 年 1 月 24 日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举办的《全球化莎士比亚：定位世界市场和档案》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全球化莎士比亚作为方法》(Global Shakespeares as Methodology: World Maps and Archival Silence) 中, 就强调了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莎士比亚研究的新景观, 其中一个主要的观点是“莎士比亚作为全球化时代的共享资源和材料的运用是可以为全人类运用的”这样的观点。Alexa Huang 在这个论坛中延续了她之前在《中国的莎士比亚：两个世纪的文化交流》所运用的观点和方法论。《中国的莎士比亚：两个世纪的文化交流》Chinese Shakespeares: Two Centuries of Cultural Exchang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2011), 获多项国际学术奖, 包括 MLA Aldo and Jeanne Scaglione Prize f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onorable Mention, Joe A. Callaway Prize for the Best Book in Drama and Theatr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n Scholars (ICAS) Colleagues' Choice Award 等。



那么,《中国的莎士比亚:两个世纪的文化交流》是一本怎样的书籍呢?首先,它的结构涉及史论,又不同于我们日常对史论的认知,分为引言和正文四部分:第一部分“全球化的文化定位”、

哥伦比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莎士比亚：两个世纪的文化交流》封面

第二部分“道义空间的虚设”、第三部分“实践和作品”、第四部分“后现代莎士比亚的东方景观”。这种结构取消了传统史论的宏大叙事，把散落在两岸四地的莎士比亚演绎用“块茎”的结构连缀在一起。它不再固定东方和中国的地理相对于西方的“东方”、“偏远”特征，而是用全球化的崭新视角重新绘制了她的学术地图。在这个地图中，全球化没有东西的刻意界定。“全球化的文化定位”开门见山聚焦一种全球化时代中不同文化和区域吸收莎士比亚的新文化能量，从而引导出一种超越二元对立式的观点：

莎士比亚 - 中国的关系不仅仅是亚洲与盎格鲁 - 欧洲读者认同的部分，而且还建构历史移动中的“再现”景观，莎士比亚的戏剧吸取了许多不同政治和审美功能，允许中国艺术家和观众通过一个“他者”的莎士比亚看待舞台上呈现的“中国”。这些交互形成多元的模式(multifaceted modes)而不是单一的模式、僵化的模式。^[8]

第二部分“道义空间的虚设”部分聚焦于中国自从被列强打开门户，引进莎士比亚之后的对于民族性和国民性方面的知识分子反思，包括林纾、鲁迅、梁启超、黄佐临、焦菊隐、赖声川、吴兴国等延续一百多年的“体/用”关系的演绎；第三部分“实践和作品”收录的戏剧和戏曲改编和演绎案例有1960年焦菊隐导演的《哈姆雷特》，1983年台湾导演Tisa Chang, Pan的《仲夏夜之梦》，以及1984年Daniel S.P. Yang在香港导演的《威尼斯商人》，1999年曹路生在上海、香港等地上演的《谁杀了国王》以及2001年大陆导演林兆华的《理查三世》，2006年冯小刚根据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改编的电影《夜宴》，可谓在汉语世界里一个十分详实资料的研究成果。书籍中还收录了一些与莎士比亚戏剧改编和演绎相关的戏剧活动。第四部分“后现代莎士比亚的东方景观”聚焦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吸收莎士比亚资源的成果，包括1984年在香港举办的莎士比亚戏剧节；1986年中国大陆北京举办的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以及1994年上海举办的第二届莎士比亚戏剧节等节会；2003年台北的莎士比亚戏剧节，2008年“永恒的莎士比亚”北京戏剧节等。这些两岸四地的演出案例，具有“多元异质链接”的特征。作者不仅梳理了历史演绎，比如随着1877年St. John's University在中国建立，莎士比亚文本首次进入大学的阅读体系；还将这种中国对莎士比亚的吸收和利用放在两岸等不同的案例上。不仅提出了这些借鉴中的盎格鲁撒克逊中心主义，也介绍了中国戏曲具有的一种文化上的糅合之功能。特别值得关注的是，Alexa Huang以较详实的材料介绍了中国在文化革新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新文化交流能量：糅合话剧和戏曲的那种中国特色的能量，这些重构和“东方化拿来”案例包括黄佐临在1980年代实践的结合戏曲元素的写意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从精致的现实主义舞台背景设置，到运用灯光进行背景的写意之巧妙转换）、昆曲《血手印》（基于《麦克白》的文本改编，借用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梅兰芳的想象化和写意手法）、田曼莎的川剧《谁在敲门》（把内在的张力视觉化）、台湾吴兴国当代传奇剧团于2004年改编的《暴风雨》（借鉴了东方的视觉元素重构）等舞台实践，可谓详实、准确地论证了文化交流可以互相运用和借鉴的观点。

其次，有了这个区别于传统二元对立的论点，Alexa Huang的立论方法是多元的、块茎式的结构。文化的交流，需要瓦解一些传统的二元对立观念，比如“中心 - 边缘”、“西方 - 东方”、“强势 - 弱势”等固有的思维定势和思考习惯。实际上，所有的文化交往的基础和出发点是处在浮动和永远的所指、能指游戏之中的。即诉求在不断的变动之中。在一次我对她的专访中，她承认用霍米巴巴式、斯皮瓦克式的“杂糅”、或者德勒兹的“块茎”等词汇、概念思考“莎士比亚全球化”或者“莎士比亚中国化”比较客观。许多时候，文化的交往取决于两种文化之间的彼此需求和交往的内容。文化交往的模式，一个例子就是剧作家、导演、戏剧理论家彼得·布鲁克在东方印度等地和西方（伦敦等地）所进行的戏剧实践，在西方主流的伦敦西区或者百老汇剧场中，他的作品就是非主流，甚至边缘。但是，戏剧的实践和影响力从来都应该超越这个框架。缘于他的形象和影响力，就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时候成为推销英国文化的大使；另一个例子是密歇根大学的大卫·波特（David Porter）的一本研

究十八世纪中国和英国的文化交流的详实案例的书籍《十八世纪英国的中国口味》，在这本书籍中，中国、英国两个国家在十八世纪的茶叶和瓷器等贸易，直接影响了“英国现代文化”的构建和英国的中产阶级文化生活趣味的养成（喝茶和以十分需要的“他者”的眼光欣赏、消费东方的文化习惯）。通过“英国文化生活的被建构”，来说明文化这个概念的自身杂糅性和形成性、浮动性，以及某种程度上超越政治、经济等元素的不确定性。^[10]

因此，Alexa Huang认为文化的交往从来都带有糅合的特征之发现，是带有全球化时代一种文化交往的平等性之内在要求的。任何区域文化吸收异邦文化的后果都将产生另外一种图像（icon）和区别于原始舞台图像的再现（representation）。无独有偶，这些地域化的改编策略，也可以在台湾王墨林导演在改编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的案例中找见。重新编写与诠释的舞台演出文本《安蒂冈妮》，除了引录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原著台词之外，还引用韩国木刻画家洪成潭关于光州5·18民众抗暴事件的诗作，以及小说家黄哲日英《悠悠家园》段落……因此，台湾学者于善禄认为：“（这个表演作品）回应东亚的戒严历史，更为古希腊悲剧的经典女性形象与当代亚洲的情境建立起具体的连结。（戏剧的主题）融入了这几年来与韩国戏剧交流后的东亚戒严观，不再只是往内钻探戒严的国家暴力体制之核，而是往外连结亚际（inter-Asia）文化的批判之网。”^[11]

Alexa Huang论述的方法借用了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加塔利的“块茎”理论。“块茎”这个概念是德勒兹和加塔利在他们合著的文本《千高原》中提出来的，用来形容一种四处伸展的、无等级制关系的模型。与根-树模式或胚根模式的二元逻辑的“精神实体”相反，块茎作为一种开放的系统，强调了知识和生活的游牧特征。在块茎的发展中，它不会追随任何固定的模式或路线。Alexa Huang之“莎士比亚中国化”之主题书籍借鉴“块茎”理论的意义如下：中国学者的莎士比亚研究之出发点，完全可以超越“东/西”、“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避开这些被权力、政治无意识所绑架的偏见，而选择一个比较客观的切入点。比如，文化交流的那种“间性”的普遍性，以及这个模式中的诸多移动中的特征，它显示出传统文论所不具有的无意性、断裂性、自然性、自由性、开放性、宏阔性、繁殖性、多元性等特质。这些特质，为我们研究（莎士比亚传播）当今多元文化情势和文学创作及批评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12]通过这些呈现块茎结构的巧妙构架，Alexa Huang文化“拿来”的主体的策略，在叙述和论述结合的方法中得到了彰显。这也是身为台湾出生的她成为一种融入美国主流又成为一种文化交互能量存在之身份的再确定策略。

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在Alexa Huang的著作中，莎士比亚是作为复数的形式出现的。所谓复数，不是指莎士比亚就是英国的文化代言人，或者“复兴莎士比亚的教诲，并且成为他在盎格鲁世界的永久训导的代理人”这样的文化狭隘主义的观点。莎士比亚作为复数的观念，来自于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莎士比亚资源的利用。比如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的“全球化莎士比亚”研究部门对于全球莎士比亚戏剧、戏曲改编和演绎案例的收录和文字（包括中国的京剧、越剧等剧种的改编）。由于独特的、又是专业领域内少见的梳理历史和当下独特的“莎士比亚/中国”之时代互动框架，以及糅合表演实践的史论、观念谱系和块茎状的立体结构之构建，本书获得了包括MLA Aldo and Jeanne Scaglione Prize奖项在内的许多荣誉，在西方的主流媒体上获得了业内专家的赞誉。这些赞誉和客观评论，都是对这个独特的“史论、理论、块茎结构”之三元学术框架和体系的呈现——包括从比较文学和普遍人文角度——所作的回应。如美国《现代哲学》杂志这样评价她的工作：《中国的莎士比亚》一书结合了历史研究和理论洞见，这些洞见包括文化的图像往往（比理论）走得更远，融入了新的被研究的文本中。Huang做了件了不起的事情，将不同的枝节——包括那些难以穿越的融入在过去历史中的表演——串联在一起。总之评论界对她融合戏剧、表演史论和理论谱系的能力表示了钦佩。

Alexa Huang的“全球化莎士比亚作为方法论”的研究证明，通过史实和理论的结合，

产生的一个对于正在显现的文化事实——就是莎士比亚作为一种材料，在不同的文化中承担着各自建构自身文化的功能，而有时候，这种吸收和交流，并不是有着一个固定的模板——的把握。正如大家逐渐取得的共识：在全球化的今天，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文化，对莎士比亚做出特定的解读，这是莎士比亚永恒性和全球性的重要表现。通过她细致和多元结构性的新布局，和全球化趋势中的一个文化交往案例分析，也明确了全球化的文化活动中需要包含时间性和主观性、意向性诸多性质集合在一起的“合法性”之能量。

在与 Alexa Huang 交谈前，我还在犹豫：杂糅、后殖民、去中心 / 边缘对立思维是否是我们最终的权宜之计？而通过访谈，我深信了，一个亚洲血统的学者，如何在西方社会浸淫良久之后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如何为非西方血统的学者提供一种研究莎士比亚的弹性的建设性理路，实在是一种没有退路的选择，值得有全球视野的东方学者借鉴。

参考文献：

[1]Alexa Huang,Chinese Shakespeares: Two Centuries of Cultural Exchang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9

[2]David Porter,The Chinese Taste in Eighteenth - Century England Paperbac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

[3]Tian Junwu,Shakespeare Study,Its Controversy and Re - evaluation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A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David Scott Kastan,《外国文学研究》,2012(2):1-7

[4](美国)阿兰·布鲁姆、(英国)哈瑞·雅法：《莎士比亚的政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6页，第100-137页。

[5](美国)张英进，《影像中国：当代中国电影的批评重构及跨国想象》，胡静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405-406页。

注释：

[1]当代重要的思想家、政治哲学家。斯特劳斯学派中的重要人物。著有《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

[2]列奥·斯特劳斯的一位有名的学生，著名的保守派学者、政治学教授，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

[3](美国)阿兰·布鲁姆、哈瑞·雅法：《莎士比亚的政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前言：政治哲学与诗：第1-10页。

[4]卡斯坦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博士。1973-1987年执教于达特茅斯大学，1987-200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比较文学教授，现为耶鲁大学 George M.Bodman 教授。作品有：《牛津英国文学百科全书》(五卷本)(2006)、《失乐园》(2005)、《莎士比亚读本》(1999)、《英国早期戏剧新史》(1997)、《莎士比亚研究指南》、《新莎士比亚研究指南》等。

[5]Tian Junwu,Shakespeare Study,Its Controversy and Re - evaluation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A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David Scott Kastan,《外国文学研究》,2012(2):1-7

[6]此段观点摘自(美国)张英进的《影像中国：当代中国电影的批评重构及跨国想象》一书(胡静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405-406页)。

[7]该网站网址为：<http://globalshakespeares.mit.edu/>，主要宗旨是通过提供“全球化莎士比亚”的表演档案，显示多样性，增进合作。

[8]Alexa Huang,Chinese Shakespeares:Two Centuries of Cultural Exchang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9:24

[9]David Porter,The Chinese Taste in Eighteenth - Century England Paperbac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

[10]于善祿，《<安蒂冈妮>的当代转喻》，台北：《牯岭街小剧场·文化报》，2014年1月29日。

[11]杨海鸥，《德勒兹的“块茎说”对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的挑战》，《外国文学》，2010年03期。

责任编辑 原旭春